

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研究

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福建历史文化 与博物馆学研究

——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福建省博物馆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新登字 02 号

主 编 郑培升

副 主 编 陈 龙 王振镛

执行编辑 杨 琮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顺序)

王振镛 王声源 陈 龙 郑培升

林 刊 黄 政 程必宏 曾 凡

书名题字 郭勋安

摄 影 郑恢基 杨作鑑 卢今刊

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

——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福建省博物馆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大梦山 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19 号 邮编：350011)

787×1092 毫米 1/16 20.75 印张 490 千字 8 插页

1993 年 3 月第 1 版，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34—1232—x 定价：平装：19.50 元
G · 894 定价：精装：2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福建省博物馆自1953年筹建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路程。在这四十年中，她的脉搏始终追随着我国我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在跳动。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道路中，她经历过曲折的历程。但发展和前进却是她的主流。

这四十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省博物馆经过两代人的披荆斩棘、上下求索，从白手起家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展厅一万平方米，馆藏各类文物标本十五万件的收藏研究和社会教育的基地。

四十年来省博物馆共举办了数百次各类固定和巡回的宣传展览。展览的内容包括福建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出土文物、社会发展史、革命斗争史、近现代史、自然科学、国情教育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宣传等等。它接待过数千万各行各业和各地区的观众以及海外游客、港澳台同胞。1991年已被列于福州市十大德育教育基地之首，并成为福建省面向国内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窗口。

在四十年的努力奋斗中，省博物馆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的专业人才队伍，他们的科研、陈列成果，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影响。特别是在对福建历史的研究及文化遗产的发掘方面，已有了令人瞩目的建树。

四十年来，通过艰苦细致的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以出土大量的古代遗物资料及深入的研究结果，建立起福建史前时代的历史编年。尤其近几年来，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调

查，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许多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福建远古历史的空白，把福建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至数万年前，并就此论证台湾岛在远古以前，就与福建有着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

在福建文明时代早期的历史研究方面，福建省博物馆自1958年至今，先后两次发掘了武夷山（原崇安）城村的汉代古城址，出土了数千件不同种类的文物标本及数十万件文化遗物，清理出几组面积巨大、规模宏伟的宫殿建筑群遗址。经深入研究，揭示出二千年前兴盛一时的闽越国文化，展示了福建灿烂的上古文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文明时代以后的整个福建历史研究中，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断地配合全省基本建设而进行的大量的考古发掘、专题调查，以丰富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填补了诸多空白，充实丰富了福建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些出土文物、考古新发现和研究，都使我们得到了单凭古籍所不能看到或不能完全获得的历史知识。

福建省博物馆以这些考古发现的历史遗物为基础，办起福建历史文化的陈列展览，以生动的物象和历史文献记载的知识相结合，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起到了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巨大教育作用。

在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一长期艰苦奋斗的历程，该馆与福建教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这部文集。文集中除了对这四十年工作的回顾及馆史资料的汇集外，所收进的论文大都是对福建省历史文化及博物馆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研究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从远古旧石器时代直至现代。较多地应用了文物资料，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探讨了福建悠久的古代文化和有关历史问题。其中以福建史前文化、闽越文化、古民俗、古陶瓷、地方史专题、茶文化及博物馆学方面为重点，展示了福建省博物馆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特色。书中所收的研究论文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在博物馆成长锻炼或培养起来的老、中、青年专家和专业人员。还有一部分研究论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厦

门大学等单位的著名学者、专家，为祝贺福建省博物馆四十周年馆庆而撰写的。我们把这些论著看作馆外知名学者送给省博四十华诞的珍贵礼品。

辛勤的耕耘，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福建省博物馆在四十年的艰苦创业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衷心地希望福建省博物馆全体同仁，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精神鼓舞下，秣兵厉马，再接再励，在考古研究、陈列、保管等一系列专职工作中，争取更大的成绩，以无负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

李联明

1991年11月

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

——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前 言 李联明

目 录

- 回顾与展望 郑培升 (1)
辛勤耕耘结硕果
——福建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四十年 王振镛 (6)

考古与史前文化

- 闽台史前考古的发现与展望 陈国强 (19)
清流狐狸洞人类化石的初步研究 尤玉柱、董兴仁、陈存洗、范雪春 (26)
福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之研究 严晓辉 (30)
福建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与年代初论 陈存洗、杨 琮 (42)
从考古发现谈福建史前社会的发展问题 曾 凡 (52)
福建史前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吴绵吉 (61)
福建境内史前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区系类型 林公务 (69)
九龙江流域先秦文化发展序列的探讨 郑 辉 陈兆善 (89)

闽越文化

- 再论福建崇安古城的时代和性质 蒋炳钊 (97)
论闽越及闽越文化 辛土成 (107)
武夷山闽越国故城出土铁器的初步研究 杨 琮 (116)

古代民俗

- 福建崇蛇民俗研究 林蔚文 (136)

- 闽赣悬棺葬的比较与族属研究 林忠干 (148)
仙字潭岩画新考 欧潭生 (156)

古 陶 瓷

- 试论福建古代陶瓷的生产与外销 叶文程 (163)
福建古瓷窑考古概述 栗建安 (175)

地方史专题

- 泉州南朝以前的历史考古问题 黄展岳 (182)
福州中唐文献予遗
——《元和八年毡场山亭记》残碑考辨 陈叔同 (190)
福建宋代教育探略 黄政 (206)
明末至近代西方教会在闽活动述略 蔡小妹 (222)
福建船政局在清末海军中的地位 林平 (230)

茶 文 化

- 闽台茶文化探源 陈龙 (241)
略论茶艺文化 吴雅真 (250)

自然与人类

- 论人类活动对福建野生动物的影响及其对策 李树青 (254)
海峡两岸的宽尾凤蝶 林平 (263)

博 物 馆 学

- 略论文物征集与藏品管理 黄汉杰 (266)
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探讨 梅华全 (278)
关于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问题 邓华祥 (284)
保管部工作的总结与认识 章敏珏 (287)
关于博物馆自然陈列中植物部分的设想 余怡健 (293)
试论藏品征集与地方博物馆发展的关系 林存琪 (296)
略谈南宋黄升墓出土文物的保护 毛秀珊 (299)

馆 藏 文 物

- 沈周《竹西幽居图》 谢桂萍 (303)
李纲铜 林桂枝 (305)

馆史资料

- 福建省博物馆 1972 年至 1983 年情况纪实 周 涛、龚文京 (306)
福建省博物馆四十年大事记 (309)

回顾与展望

郑培升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中，我们迎来了福建省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回顾四十年的历程，在漫长的道路，虽然遇到过许多曲折和困难，但在各级领导和全馆同志的共同奋斗下，我馆在各项业务工作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上，都已初具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说这四十年也是求索奋进的四十年，胜利的四十年。

1953年，经福建省人民政府、省文化局决定，将原福建省人民科学馆的一部分改建成福建省博物馆。4月7日，福建省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当时，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也迁入博物馆，合署办公。当年博物馆草创时仅有编制12人，加上省文管会的18人，两单位人员才30名。馆机构仅设二组一室，即文物组、博物馆组和办公室。文物组负责文物保护和管理，以及考古调查和发掘等项工作；博物馆组负责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管，另外还负责举办展览和陈列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当时在各项工作的开展上，大家常常是共同协作，合力攻关的。

我馆创立时的家底，只有从福建省人民科学馆分过来的自然标本，而历史文物基本没有。所以说是一穷二白，完全是白手起家。在建馆的当年，馆筹备处即开始着手组织历史文物的征集，组织考古调查及配合我省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组织与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相配合的陈列展览。

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生活和环境比较简陋、艰苦，必要的工作设施、设备或没有或很落后。就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全体同志仍然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各人的主观能动性，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地投入我馆繁忙的创建和各项业务工作中。

在文物考古方面，1953年以前福建省的文物古迹的发现和保护方面也可以说是一张白纸。省博物馆成立后，经过文物组同志们4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的收获。通过一系列的文物普查、专题调查和考古发掘，现在已拥有地下出土的文物标本十多万件，并且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树起福建早期历史的编年序列。

在省馆创建之前，福建地区的古代历史，史学家们仅能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到汉代闽越国以后的历史，至于先秦时代，古籍只记载为“七闽”地。30年代林惠祥教授在闽西的考古调查中，了解到福建地区也曾经历过新石器时代。但对史前历史的文化面貌及年代、谱系等，尚

一无所知。经过文物组（考古部）两代同仁的艰苦奋斗、深入探索，终于取得了巨大的丰收，基本建立起福建史前史的年代和文化发展序列。并且将福建地方历史的发展以生动的实物物象联结起来，通过展览手段展现在八闽儿女的面前。在福建历史编年和古文化谱系建立的背后，浸润着省博物馆两代考古工作者的血汗。他们的足迹和汗水遍布八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风餐露宿，以艰辛的劳动，严谨的科学精神，用汗水和心血一处处、一环环地填写着从史书中所了解到的福建古代文化长链中的每一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只能从“地书”中发掘出来。这项发掘则又需要长期的辛勤劳动，需要血汗和时间，需要生命的忘我投入。

从 1954 年至 1974 年的 20 年间，省博物馆考古组先后对闽侯昙石山古遗址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清理出许多史前时代先民生活的遗迹，出土了大批的文化遗物。通过深入研究，确立了第一个有代表性的福建史前地方文化，命名为“昙石山文化”。从而使福建省的史前地方文化，在我中华史前文化圈中占有一席应有的位置。

在此之后，又经过多年辛勤的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年来我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共同攻关，攻克了福建以往旧石器时代历史的空白。先后在闽南、闽西发现和发掘出古人类遗骨化石及旧石器、小石器和远古时代动物群化石。把自旧石器时代至先秦以前的福建史前文化序列的框架建立起来。也为探索闽、台远古的关系及古文化的联接，廓清了道路，取得了重大进展。

此外，1958 年我馆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崇安城村汉城遗址。经 1959 年的初步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材料、陶、铜、铁器等汉代遗物，揭示出福建地区汉代即有高度文明的史实。1980 年至今，我馆考古部又组织人力对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勘探发掘和研究，揭露出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代遗物。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通过有关发掘者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出这座城址的具体年代，揭示出其为闽越国时代的王城。从而确立了闽越国历史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秦汉时代的重要地位。初步解决了以往悬而未解的闽越国社会历史的诸多问题。

在汉以后的历代考古中，我馆在 40 年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重要的有德化宋元窑址、建阳将口唐窑、建阳水吉窑群、五代闽王王审知墓、闽国第三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宋代黄升墓、茶园山宋墓及尤溪宋壁画墓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丰富、精美的地下出土文物，谱写了古代福建地方文化的新篇章。

有关我馆文物考古详况，另有文章专述，本文就从简了。

总之，在这一系列文物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我馆 40 年来举办了一系列的出土文物展览和福建古代历史文物陈列。把福建古代历史文化，以生动的实物形象，配以辅助手段，深入浅出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系统性的历史知识教育。

我馆创建时成立的博物馆组，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后，分支成后来的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自然部等专门的科室部门。

保管部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从简易仓房发展到专门设计的文物保管大楼。馆藏历史文

铜器、铁器、木器、漆器、骨牙器、丝织品、字画、碑刻和文献谱牒等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我们又翻新改建了一些原有的库房，增加了设备，配备的人员也都进一步专职化。

保管部除了进行文物的征集、鉴定、收藏外，还能够对许多珍贵文物实施保护性处理。如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一批精美的丝织品，就是经过我馆保管部进行科学处理后，收藏起来的，至今这些丝织文物都完好无损。显示了省博物馆保管部的文物保护和收藏水平。近年来保管部又组建了文保实验室。文保实验室建立后，即对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性物理、化学处理，使许多出土时受损、受蚀的文物得以复原和保护。还与考古部协作，搬迁保护了尤溪城关发现的宋代壁画墓。为我省文保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省博物馆创建至文革以前的12年间，我馆的陈列展览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史和对敌斗争、出土文物这三大任务展开。在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举办的展览中，比较重要的如1953年举办的《工人生产成绩展览会》，1954年举办的《省工业建设展览会》，1956年举办的《水利模型展览》（巡回）、《益鸟害兽展览》、《福建森林与矿产资源展览》、《兴修水利与农作物优良品种展览》，1958年举办的《人民公社好展览》、《大炼钢铁展览》，1959年举办的《十年农业革命与成就展览》、《福建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1960年举办的《全民养猪展览》（巡回），1963年举办的《福建动物与矿产资源展览》、《福建省防治农作物病虫鸟兽害展览》等等。在有关革命史及对敌斗争的陈列展览中，比较重要的如1957年举办的《福建革命文物展览》（巡回），1958年举办的《在站起来的人们面前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巡回图片展）、《福建革命史略展览》，当年的《福建海防前线对敌斗争展览》曾先后在华东的上海、南京、合肥等大城市巡回展出。1959年举办的《福建十年社建成就展览》中的《对敌斗争馆》，1961年配合中国军事博物馆在福州举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展览，1963年举办的《粉碎窜犯大陆展览》（巡回），1965年举办的《福建省阶级斗争展览会》等等。在出土文物的陈列展览中，比较重要的如1955年配合鹰厦铁路的修建在沿线举办的《新发现文物巡回展览》、在福州举办的《华东地区基建工程出土文物展览》，1958年为配合文物普查在全省各地举办小型文物展览500余场，1962年举办的《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文物资料展览》、《福建出土文物展览》等等。此外，这一时期我馆还举办了一些其它类别的展览，其中较重要的有1956年举办的《福建民间工艺品展览》，1959年《福建十年建设展》中的《文艺馆》部分，1962年和1963年的《福建民间工艺品》展览、1963年举办的《福建动物标本展览》等等。

在文革中间，我馆被当作“四旧”及“封、资、修”，横遭批判和冲击，正常工作一度停顿和中断，人员被下放。文革后期，工作逐渐恢复，1971年至1976年，逐步开始配合当时的形势和需要举办了一些《英雄人物事迹展览》、《福建美术摄影展》、《福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福建出土文物展览》、《全省革命文物汇展》等等。

文革结束以后，我馆的各项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和重大起色，陈列部开始走上正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的十几年中，我馆举办了多种类型的陈列展览，内容日益丰富。除了进行如《福建古代历史文物陈列》这类固定展览以外，还独办、协办、引进了多种形式内容的专题展览。其中我馆独办的展览有：《馆藏书画展览》、《明清书法展览》、《巨鲸展览》、

《龙展》、《革命文物联展》、《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纪念展览》、《辛亥革命在福建历史文物展》、《馆藏字画展》、《崇安汉城遗址发掘汇报展览》、《福建珍稀动植物矿物标本展览》、《福建省革命文物展览》、《动物分类陈列》、《谢成汉捐献文物展览》、《陈英、金岚捐献字画展览》、《文物法颁布十周年成果展》、《畲族民俗文物展》等等。我馆与其他单位协作举办的展览有：《中国历代货币展览》、《闽西名画家作品展》、《福建陶瓷展览》、《德化古今陶瓷展览》、《李耕父子画展》、《蝴蝶展览》、《纪念辛亥革命、促进祖国统一展览》和一些个人的画展、摄影展、装饰陶瓷展览等等，还应邀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举办《德化窑古陶瓷展览》。引进外地和兄弟馆的展览有：《东北抗日英雄事迹展》、《清代帝后生活文物展览》、《新疆古尸展览》、《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览》、《内蒙古民族文物展览》、《性的自然发展史展览》、《洛阳唐三彩展览》、《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展览》、《国际友谊珍品展览》、《满城汉墓金缕玉衣文物展览》、《秦始皇兵马俑展览》等等。

总之，40年来我馆陈列部门共举办了数百次固定或巡回的陈列展览，接待了上千万各行各业各地的参观者，以及海外游客、学者和港、澳、台同胞。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学龄儿童，都在博物馆的参观中学到了日常生活中和课本上所没有的东西，增长了各种知识。

我馆自然部除了征集、采集自然动、植物标本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动、植物陈列展览，丰富了社会各层、尤其广大中小学生课外的自然生物知识。还配合其他单位团体在福建野生动植物、珍稀动、植物的发现和保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在科研方面，40年来我馆新老两代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先后在多种学科的学术刊物上撰写发表了近千篇有关考古发掘、调查的学术报告和历史、文物、民族、民俗、博物馆学、动植物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还组织编写了《福州黄升墓》、《德化窑》、《闽越考古研究》等书刊。不少专家还著有专著。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在社会上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显示了我馆具备的科研水平。

1979年，我馆编辑的半年刊《福建文博》创刊，至今为止，在这个阵地上，组织了许多学术研究活动。在促进我馆的学术活动方面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40年来，我们除了努力搞好本馆的业务工作外，还抽出人力和物力帮助和支持我省各地、市、县许多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和纪念馆的建设及业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全省文博工作的蓬勃发展和深入普及。

认真思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在科研方面，与内地省份的一些著名博物馆相比，我们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尽管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在今后工作的开展中，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更高的标准，尽力创造一定的学术和科研活动的氛围。加强一些重要科研课题的

形式表现方面，也要力争不断地创出新路，使我们的陈列教育能够更吸引观众，能更富生命力，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朝“走出去，请进来”更广的文化交流目标前进。为把福建省博物馆置身于世界博物馆的大系列中，而努力奋斗。

以往我馆与国内外的相关机构、单位团体，在科研、陈列和展览等业务工作的交流和协作方面，开展得还不够。特别对海外及港、澳、台方面的交流还很少，远远赶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和需要，未能很好地发挥我省的地理优势及其他方面的优势。我们地处祖国的东南大门，是台湾海峡及环太平洋西岸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化中，闽、台两地就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但我们的工作却未能跨越海峡和海洋。我们应该、也必须不被海峡和海洋所阻隔，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业务联系，让福建的古文化走出福建，走向世界。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面对深化改革的浪潮，我们博物馆事业也应该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的需要，要紧锣密鼓地进行机构改革，加速内部机制的转换，改变以往那种“事多没人干，人多没事干”的通病。精兵简政，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各项职能，搞好“两史一情”的教育。使博物馆切实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窗口。

在新的形势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提高，文物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在社会上，也有些不法分子千方百计地想钻空子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因此，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保护工作也日益重要。文物的防盗、防火、防蚀工作，应当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同时，我们福建地处亚热带，长期高温多雨，气候潮湿，自然环境对文物的保护和保管方面都有很多不利因素，文物在收藏存放中，很容易生霉受蚀。面对这些具体困难以及日益紧张的文保经费来源，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仍应将文物的安全防护、防霉蚀，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抓；并加强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加强文保实验室的各项文物保护实验和研究工作，尽快走出一条在不利环境下，用科学手段和新技术、新方法保护历史文物的新路。

回顾我馆 40 年来的历史和走过的道路，发扬成绩，认识不足，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是为了前进和提高。过去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并不平坦，可以说我馆是与共和国同命运，有过曲折和挫折、有过彷徨和徘徊，也走过弯路，但更多的是排除困难在奋进，是不畏险阻地在攀登。我们已经经过了山重水复，眼前已展现出一片柳暗花明。在这一派改革开放、万马奔腾的年代里，我们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将迎接新的挑战！党的十四大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站在这不进则退的历史大潮中，我们毫无惧色，准备勇往直前！

辛勤耕耘结硕果

——福建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四十年

王振镛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背山面海，同宝岛台湾隔海相望，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四季常青，适于人类生息繁衍。自远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奋斗，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1951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具体领导全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53年福建省博物馆在我国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中诞生了。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我馆同省文管会合署办公，在“两重两利”方针的指导下，全馆同仁上下求索，四方探寻，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丰富了本馆的收藏，充实了本馆的陈列，而且为发展我省的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建国后，在我省龙岩、连城、永安等地都发现了更新世的古生物化石，1965年7月，我馆文物组考古人员发掘了永安坑边寨岩山洞穴遗址，发现了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貘等哺乳类动物化石14种，这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点的大宗第四纪动物化石，为寻找福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文革”之后，我馆考古人员多次协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到闽西、闽北、闽南等地区进行田野工作，也发现了大量第四纪动物化石。1980年起，全省又一次开展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在将乐、明溪、清流、漳平、宁化、龙岩、永安等地发现了包含丰富哺乳动物化石的溶洞。1984年和1988年，我馆考古部两次发掘明溪剪刀墘洞穴堆积；1989年、1990年两次发掘将乐岩子洞遗址；1991年发掘清流龙津洞，都发现了大量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有狒狒、猕猴、金丝猴，东方剑齿象、大熊猫、中国犀、巨貘，虎、熊、野牛、野马、豪猪、野猪、山羊、狼、獾、鹿类以及啮齿类动物等，共30余种。继1987年春东山县博物馆征集的采自海底的一小块轻度石化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人类右肱骨残片后，1988年5月，我馆考古人员率三明市文物普查队在清流县沙芫乡洞口村狐狸洞内发现一枚晚期智人下臼齿化石，距今约一万年以上。这

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有层位记录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1989年又在同一胶结层中发现巨貘、熊、豪猪、鹿等晚更新世晚期动物化石和五枚人类牙齿化石。继1987年初我馆考古人员在同安县新墟发现打制小石器，1989年漳州市文物干部在北郊发现打制小石器之后，1990年5月，我们协同中科院专家及漳州市文化局等发掘了漳州北郊莲花池山遗址和竹林山遗址，出土了一批打制石器，为探索闽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及远古时期闽台文化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二

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严格地讲是从我馆考古人员（华东文物工作队）1954年1月调查、发掘闽侯昙石山遗址开始的。昙石山遗址从1954年发现至1974年，先后共发掘了七次，揭露面积共1000平方米，其中以1965年的第六次发掘规模最大，并弄清了该遗址文化堆积的层次，为确立闽江下游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明确的地层依据。这三层文化内涵的主要特点是：〈1〉石器以小型石锛为主，多磨制不精；陶制工具仅见纺轮和网坠。此外尚有少量精制的骨器和蚌器。陶器以红陶为主，有泥陶，夹细砂，夹粗砂等种，多为手制，但表面抹平或磨光。多为圜底或圈足器，有釜、壶、罐、盆、豆等，其装饰有压印，锥刺，刻划，镂孔，拍印及附加堆纹，彩绘，施红衣，素面磨光等手法，纹样有绳纹，凹点纹，圆圈纹，红彩卵点纹。彩绘易剥落。〈2〉中层生产工具除石锛、石刀、石凿、石镞等外，还有骨器，牙器和蚌器。石器磨制较为精细。陶器以粗砂绳纹陶为主，泥质磨光陶次之。陶器多为轮制，有釜形鼎，釜、豆、簋、壶、碗、杯等，装饰手法如下层，纹样出现条纹、方格纹等，除圆形镂孔外，又有长方形、十字形、半月形镂孔，饰于豆的圈足上。彩绘的红彩不易剥落。〈3〉上层有石矛、骨矛等，有段石锛增加，石镞除柳叶形外，还有三棱形者。新出现彩陶纺轮，较坚硬。陶器以橙黄色、灰色的几何印纹硬陶为主，出现了凹底器及大型容器，器形有罐、豆、盆、钵、尊等；除拍印几何纹外，还有彩绘，刻划，附加堆纹，着黑衣等，往往二、三种手法同时使用。纹样、蓝纹，绳纹，叶脉纹，曲折纹，席纹，回纹等，彩绘有黑、红、赭三种，以黑彩为主，线条粗放，构图简单，多为几何形图案。

上述中、下层文化遗存，同全国诸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特点，因而被命名为“昙石山文化”。其文化面貌同邻近的浙江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有相接近的因素，其年代也应相近，推测中层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下层约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昙石山上层文化内涵比较复杂，是福建地方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此外，在闽江下游沿海地区，我们于1958年配合水利建设发掘了福清东张遗址，揭露约1600平方米。1959年试掘了闽侯庄边山遗址。1975年和1979年两次发掘闽侯溪头遗址，揭露约16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50多座。1982年至1983年正式发掘了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面积达30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60多座。通过这一系列的田野工作，我馆获得了丰富的福建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文物标本，使我们对60年代提出的“昙石山文化”的内容，特征和年代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使这一考古学文化得到了考古学界的确认。

昙石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福建东部沿海地区，除昙石山中、下层外，庄边山下层，溪头下层，东张下层等都属昙石山文化。

但是，昙石山文化并不是福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60年代我馆考古人员在平潭县海坛岛上发现了平原壳丘头遗址，敖东南厝场等几处贝丘遗址，采集到的陶片标本同昙石山文化陶片有很大差别，陶质疏松，较厚，火候低，陶色杂，纹饰有具齿纹，贝印纹，绳纹，刻划短线纹，压点纹，锥刺纹，附加堆纹等。类似的遗存也见于闽侯溪头遗址，金门富国墩及广东潮安陈桥等地。1985年我们正式发掘了平潭壳丘头遗址，揭露面积约8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20处，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文化遗物。

壳丘头遗址的石器，打制和磨制的均有，打制后稍加粗磨的较多，磨制石器中以小型梯形石锛为主，还有石凿和福建罕见的穿孔石斧，以及数量较多的河卵石制作的石球。骨器有笄、匕、簪和凿等，玉器仅见装饰品玦一一件。陶器中较完整的主要有纺轮和支座。支座上下穿孔，酷似陶祖，为福建首见之物。日用陶器中较完整的有釜、盘、碗等。陶片以夹砂陶为主，达80%以上，泥质陶较少。夹砂陶中掺杂粗砂和贝屑的较多，胎厚，火候低，易碎，陶色杂，呈色不纯，主要器形为圜底器，有罐类，釜类，还有部分圈足壶。泥陶质地较细，但火候不高，以红、黑二色为多，有的呈色不一，器形多属豆、碗类。陶器多手制，内壁多有凹凸的垫窝。陶器装饰除少量施红衣和细绳纹外，主要以戳点、刻划、贝印为特色。戳点有方形、圆形、三角形等；刻划纹多由双线、或多线平行、转折、交叉等组成，贝印纹多用贝壳边缘在陶胎上连续、分段或转折地直接压印而组成图案。这些纹饰构成了壳丘头遗存的独特风格，既不同于昙石山文化，也有别于石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壳丘头遗存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新的文化类型，过去曾暂称为“富国墩类型”，现又称为“壳丘头类型”。金门富国墩贝丘遗址的碳14年代距今7450—5840年，据此，我们推测壳丘头类型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左右。这是目前所知福建境内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经过历次文物普查，特别是经过80年代的大规模普查，使我们对全省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1989年11月和1990年10月，我们两次发掘了浦城牛鼻山遗址，揭露面积共925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浅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数量多寡不等。陶器以灰色夹砂陶和泥陶为主，多为素面，器形有鳍形足鼎，长颈鬶，高喇叭足豆，圈足壶、圈足簋，罐、钵、杯等，少见印纹硬陶。石器有梯形小锛，柳叶形簇，穿孔铲等。类似的遗存在我省西北部山区有较广泛的分布，同毗邻的江西，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樊城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同本省东部的昙石山文化、壳丘头类型遗存有明显的差别。此类遗存的年代距今约4000年以上。

除此之外，1985—1988年我们在闽南诏安腊洲山，东山大帽山；1988年在明溪南山，清流狐狸洞等处，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腊洲山遗址和大帽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同昙石山文化有相近之处。明溪、清流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则同昙石山文化差别较大，而同浦城牛鼻山遗址相近，同武夷山西麓江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较多的共同因素。